

茂名师范：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培育革命中坚力量

朱琳 李劲

中共茂名师范学校支部遗址位于高州河西路广东茂名幼儿师范学院高州分院内。1949年，茂名师范与广东省立高州女子师范学校合并为广东省立高州师范学校，后搬迁到高州城西江坡现校址，现已改为广东茂名幼儿师范学院，而“茂名师范革命遗址碑志”就立在该校图书馆一侧。

茂名师范最早可溯源到明朝万历四十年的墨池书院，1905年改为高郡师范学堂，1930年更名为茂名县立乡村师范学校，1949年与广东省立高州女子师范学校合并为广东省立高州师范学校。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茂名师范、高州女师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师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游击小组成员100多人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在运动中培育和锻造了一批革命骨干，后来成为领导茂名革命的中坚力量，谱写过壮丽的革命诗篇。

宣传抗日，引导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茂名县各界人士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各校青年学生特别活跃，茂名师范、高州女师师生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9月，茂师师生们利用假日深入圩镇农村，宣传抗议救亡，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前线。”

1943年，高州各校师生相继排练演出抗日宣传进步剧目，茂名师范演出革命话剧《杏花春雨江南》，女师演出的剧目是《金玉满堂》。

为了充分发挥话剧的宣传作用，地下党组织通过在学校的党员和进步师生，于1944年四五月间成立了“茂名县抗日演剧宣传队”，队长是茂名中学的教师，总务长当时是茂名中学的学生李一鸣(后来也是茂名师范学生)，演出组长是茂名师范学生梁德英。剧宣队成员绝大部分是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其中还有地下党员、游击队成员。他们演出的进步剧目为宣传和推动抗日救亡起了很好的作用，令广大青年受到爱国抗日精神的陶冶，后来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甚至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茂师、女师两校为革命牺牲的有李嘉(女)、周嗣芳(女)、李淑明(女)、梁德玉、梁钊汉、罗淑英(女)、曾乙福(女)、李锡福等烈士。

成立读书会，开展学生运动

1940年底，茂名县地下党领导人李明华、陈华及车振伦在高州师

范学校以任教作掩护，团结进步教师周梦吉、陆士风等人，组织进步学生秘密传阅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革命书籍，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逐渐形成读书小组，人员不断扩大，至1943年发展成为读书会。茂师11班、12班先后吸收了钟正书、郑光民等20多人加入读书会。读书会秘密组织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激发革命热情，对学生追求革命真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高州女师为省立学校，号称广东南路女子最高学府，吸引着高州六属的优秀女青年竞相报考。中共地下党组织非常重视这间学校，希望能培育出一批品学兼优、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妇女人才。开办第一学期，中共茂名县特派员李明华亲自到该校任教，动员了一批进步女青年报考该校就读。其中李嘉、梁惠珍、李乃珠三人原是张炎举力的妇女服务队骨干，工作活力很强，深受同学爱戴，她们深入联系教育同学，发动大家阅读进步书报，宣传进步思想，同学们感到她们是贴心人，很快就有一批进步同学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1946年4月，国民党茂名县政府以“缺钱粮”为由，无理扣发茂名师范学生津贴和教师薪饷，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公愤。茂名县地下党负责人林其材与茂师党支部及游

击小组相关人员决定串连进步师生，向茂名县参议会请愿，参议会无视师生们的合理要求，学生们实行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得到女师、高州中学等学校的支持，经过近一个月的斗争，逼使国民党当局答应了师生们的条件，取得了这场反饥饿斗争的胜利。

建立交通联络站，成立党支部

1941年，李明华先到高州女师，后转茂名师范任训育主任，以教书作掩护，将县委机关迁回县城。为了便于离开高州隐蔽的革命同志与党组织保持联系，茂名的党组织在县内的东、南、西、北四个区都设有地下交通联络站，是年冬，茂名师范建立了交通联络站。

1943年上半年，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发动抗日救亡，建立了高州女师党支部，李嘉任支部书记。

1944年，日寇快要打通湘桂线，南路将成敌后，南方局指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独立抗日队伍，茂名县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深入农村、城镇和学校加紧扩大发展游击小组。茂名师范仅在11、12两个班的同学中就吸收了杨光武、许俊文、柯乙福等20多人为游击小组成员。高州女师在读书会中挑选觉悟较高的同学进一步动员教育，举行宣誓仪式吸收入组，约20人参加。

当时茂名师范未建立党支部，该校党员由茂名县委党组织直接领导单线联系，于1945年11月成立中共茂名师范学校党支部。该校在进步学生中发展的党员有钟正书、郑光民、龙思云、李一鸣、李颐年、梁德玉等。

各党员积极开展工作，先后发展吸收了60多位进步学生参加抗日游击小组。

培育革命骨干，在抗日武装起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中坚力量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茂师和女师的中共地下党员与游击小组成员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多人成为地下党工作和革命游击战争骨干。

1944年12月，茂电信党组织根据南路特委的部署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女师李嘉受任为茂名县妇女工作组长，组员有女师的梁惠珍和茂师的李俊瑜，负责发动妇女参加起义，动员女游击组员筹集枪械，在高州发动了30多名女青年参加，其中女师10多人。

1945年春，茂电信党组织先后以中共茂名师范、高州女师学校支部党员为领导骨干，在茂西道平和茂南烧酒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茂师的梁德玉是茂西抗日武装斗争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茂西游击大队攻打道平乡公所，收缴了一批步枪子弹，烧

毁乡公所文件和账册。伦道起义后因敌人扫荡梁德玉将人员分散掩蔽，2月13日在茂坡村外婆家被捕，20日被杀害于高州城东坡耀。

茂师的钟正书、龙思云是茂南地下党负责成员，为筹备好烧酒武装起义，钟正书在陈垌板桥村与罗秋云成立了陈垌中队，钟正书任指导员。2月18日，陈垌中队与飞马中队、烧酒中队3个中队160多人在烧酒村龙底小学集合，成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茂南大队，茂师的龙思云、钟正书、李颐年、罗淑英，女师的李嘉、梁惠珍等在起义队伍中分别担任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的相关责任人。起义队伍准备攻打仁里乡公所，进行侦察时发现乡公所戒备森严，敌人已有所察觉，起义受挫。女师前往参加起义的李淑明、谭琼珍在高州被捕，李淑明壮烈牺牲。

茂南烧酒抗日武装起义从组织发动到队伍解散，历时3个多月，在敌人的围攻下，虽然失败，但这次起义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揭开了茂南武装斗争的新篇章，亦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

解放战争时期，郑光民、钟正书、李颐年、龙思云、李一鸣、柯乙福等人依然是茂名县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茂电信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根据地，为茂名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席草编织着的岁月

程秀琼

那席草，那石碾，那石桥，那木锤，还有那春席草的声音，都在我的心里，丰满了我的记忆，温暖了我每个思乡念亲的夜晚。

我出生在电白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村子南临沙琅江，北连几十亩的荷塘，东靠一个小山。小时候，村子里只有二十左右户人家，总人口不超过二百人。乡亲们白天耕种，从地里回来，便是织草席。到了晚上，每家每户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沙沙沙”“沙沙沙”地摆弄着席草，编织着布帛菽粟，编织着油盐酱醋。一张草席的诞生，就是一个希望，卖出去可得三块多到四块钱，除了席草本钱，能攒上两块多。村子里大人小孩都会织草席，我七八岁开始就跟着父母织草席了。

把一捆捆圆筒的席草，织成席子，要经过湿草、碾草、春草和编织等工序。如果误了湿草时间，就会影响一天的织席工作。有时候母亲干田活回来会说：“今天还没有湿草呢。”在席里(用旧草席在地上垫着织新席子)蹲了一个上午的我，正想出去活动活动。听到母亲的话，便问清楚母亲准备织大席还是小席，然后选了相应长短的席草，扛到荷塘边，把席草放到荷塘里浸泡。此时我的心情非常舒畅，觉得荷锄比放牛时看到的要美。席草很快就浸泡透了，我便扛着变重了的湿草回家，放在阴凉处凉着。

不管哪个季节，不管天气冷还是热，清晨、黄昏和有月的晚上，生产队晒谷场上总是热闹的。这些时间段，人们不用干田活，便扛着一两捆，甚至三四捆泡过凉干的席草，爬上村后小山山顶的晒谷场去碾。晒谷场上有几个石碾，主要是用来打禾的(还没有脱粒机之前，只能两手抓着禾苗往石碾身上打，禾穗接触石碾，谷子便脱落，我们家乡叫这工作为“打禾”)，不知何时又成了碾草的工具。石碾直径七十厘米左右，石身光滑，虽然笨重，却也能推移。去碾草的大多数是大人，而我父亲经常不在家，弟弟妹妹众多且幼小，母亲忙不过来，所以我十零岁就常常扛着席草上晒谷场去碾了。邻家的小姐妹水妹也经常去碾草，力气气小，单独一个人推石碾很吃力，于是我们约好碾草草时间，一起合作。我们把席草首尾连着放在硬底晒谷场上，合力推着石碾，来回碾着席草，不用费多大的劲，就把圆筒的席草碾扁了。

碾扁了的席草还不够软，还要春过，才能编织。村里只有一条春草的石桥(石板桥，约四十厘米宽，两米来长，用来垫着席草卷)，安放在村子与晒谷场之间的队屋的走廊里。草锤是用木桩修整而成，一米左右高，全身光滑，接触席草的底部比较宽大，直径约二十厘米，手抓的位置比较小。人们把草放在石桥上，提起木锤，用力春下去，一锤接着一锤。汗水从头上、身上和手掌上冒出来，席草在木锤下慢慢变软。那春草的声音，早晨不停，晴天阴天不停，成了小村子四季最美的音符和旋律。

编织草席的环节，虽然不是体力劳动，但也不轻松。要长时间蹲在席里，低着头，弯着腰，屈着脚，十指不停地伸屈着捡草条。我从小就熟悉了编织草

席的步骤：耕草，折角，收边，割边(割去席子收边后长出来的草头)，每一步我都能独立完成。放学回来，白天不用放牛或打柴时，我基本上就是在家织草席。放假时，我和还很小的妹妹每天能完整织好三张中席(三尺五六宽的草席)。

当时我们家只有两间住房，里面一间是父母的卧室，摆放着两张床，弟弟妹妹都睡在里面；外面一间既是客厅，又是奶奶和我的卧室，也是饭厅，更是织席的工作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小的我，晚上都跟着父母编织草席。我蜷缩着身躯，眼睛定定地看着、手不停地摆弄着席草。虽然，行动不便的奶奶坐在床上，会不时地跟我们说话，说很多有趣的人和事，但我还是慢慢地觉得很困了，便把头贴在膝盖上休息。此时，父亲就会说，“孩子，你去煲番薯饭吧。”不过，父亲说完还要看看身边的母亲，以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有时会说，家里就还有那一点米，要留作三餐之用。这时，父亲会说：“煲吧，女儿跟着我们熬夜，肚子不饱，太辛苦了。”然后，又对我说：“孩子，你多洗两条番薯，用你的手抓一抓米就可以了。”听到可以煲东西吃，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便到外面厨房洗好番薯和米放到瓦锅里，放好水，扛到织草席的房子里来。接着，在门角里找到那两个半备用的火砖，架好临时灶，生起火来。之后，再回到席子里继续织草席，一边等待着番薯饭香起来。

因为弟弟妹妹还太小，母亲得照顾他们，所以夜间经常是父亲带着我工作。但有时候父亲到外面卖席子当天没有回来，我便是一个人坐着编织席子。有一个晚上，我蜷缩着小小的身躯坐在席子上，两手“沙沙沙”“沙沙沙”地捡、穿着草条，编织着席子，肚子饿得咕咕直响。此时，我想到吃的，当然不敢想纯粹的白米饭，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每日三餐尚且是数着米粒而过，何况是偏僻。所以只有番薯饭可以想一想了。突然间，寂静的屋外，多种猫叫声混杂着并发，声调长长的，短短的，尖尖的，粗粗的，嫩嫩的，苍老的，凶劲的，凄凉的，痛苦的……让人听得毛骨悚然。我一下子头皮发麻，感觉到那些恐怖的声音正向我滚来。我顾不得穿鞋子了，三步并作一步，跳上了奶奶的床。奶奶拥着我，安慰着我，最后很难过地说：“可怜的孩子，要是家里有一点办法，能有番薯饭过日子，都不会让你受这样的苦的……你真是投错胎了。”那一夜，我紧紧地抱住奶奶的手臂而睡，半睡半醒中，全是猫声、番薯饭和许多织好了的草席。

艰难岁月，每家每户都织草席，虽然不能因此而大富起来，但至少可以帮补一下家用。我外出读书后，学费也是父母摆弄席草得来的。现在，人们床上的草席渐渐被竹席或床垫罩所替代，但草席是不会消失的，乡下人还爱着它，老中年人还恋着它，糖厂榨糖还需要它，我们村子里依然有人编织着它。

我的织草席岁月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但记忆中那“咚”“咚”“咚”的春草声，“沙沙沙”“沙沙沙”的织席声，依然甜了我今夜的思乡梦。

茂名印记



金色紫荆花

人们喜欢春天盛开五颜六色的百花，有一种叫紫荆花更加吸引人。

十六年前，笔者与16名退休老同志，走进紫荆花开放的地方——香港，了解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贸易、交通和民俗风情，印象深刻。

香港，素有“东方之珠”之称。我们走过雄伟壮观的青马大桥和海底隧道，看见到处是依山傍海的高楼大厦。在旖旎多姿的维多利亚港旁金紫荆广场上屹立着“香港回归祖国纪念碑”，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迎风飘扬，象征着一国两制；广场上一朵紫荆花闪耀着灿烂金光，体现了花好月圆，寓意着香港结束殖民地统治，回归祖国怀抱的辉煌前景。在这块土地上，有过辛酸的历史、痛苦的屈辱和斑斑的血泪，但也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今日的香港已从昔日的传统型转口贸易港，发展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现代化大都市。(陈桂豪)

清匪反霸是土地改革的前哨战

徐永锐

华南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败走前留下特工反动匪帮，和地方土匪恶霸结合在一起，搞暗杀活动，企图推翻解放初建立起来的人民基层政权。

我的家乡合浦县是1949年12月解放的。解放后，党组织派我的叔父徐汝斌接管家乡的公馆中学任校长。他叔父1939年入党，原在粤桂边纵第八支队任《大众导报》总编辑，他一到任，立即号召师生回校复课。复课不久，一股反动匪帮直扑学校，企图屠杀我叔父和复课师生。幸好我党武装部队县大队及时赶到追剿土匪，打死两个土匪，

割头在圩上悬挂示众，把土匪的气焰打下去。但暗藏的土匪特务改变策略，装扮为贫苦农民，身藏短枪，圩日进圩杀害我收税的革命干部。

当时，海南岛尚未解放，我解放军在北部湾沿海一带备战，征用民船。合浦县政府又组织征粮队下乡征粮支援军粮。我是在校中学生，响应号召参加征粮队到山口地区征粮。解放军派出一个班的武装人员随队保护我们。一天晚上，我随队长下村宣传征粮的意义。回队部时不走原路而另走弯路。后来在镇反中抓到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供称，当

晚若果我和队长按原路回队部就可能被埋伏在原路树林中的特务暗杀。

我于1951年暑假考上了南方大学第四期文政学院政治系。该校是叶剑英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南解放后在广州办好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为新中国培养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的指示而创办的。当时，我国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解放区土地改革三大革命运动。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叶剑英同志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决定派南方大学大部分师生下乡搞土地改革。我所在的政治系被派到茂名县参加

土地改革工作队，下乡搞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运动是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业生产力的让农民翻身作主人的伟大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的前哨战就是清匪反霸。肃清潜藏的反动匪帮，镇压罪恶极恶的恶霸，贫苦农民才敢起来和土改工作队一起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组织农会，建立贫雇农为主体的民兵队伍，巩固新生的农村基层人民政权，让农民当家作主人。我有幸参加“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的土地改革运动，为参加运动贡献青春力量而自豪。

青涩记忆

陈汝雄

酒吃油炸食品多了，因此，年前买些马蹄也成了家乡人置办年货时的必选品之一，我们村的马蹄既大又好，是不愁卖不出去的。

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上高中后的一个寒假，临近春节，父亲叫我与堂姐用板车拉了两大箩筐自家自留地里种的马蹄，沿着公路走了好几公里，然后翻越一座有个长长山坡的高山，下了山坡，来到10多公里外的相邻公社(镇)墟里去摆卖。到了墟里，赶集的人很多，很热闹，买马蹄的人也很多。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卖马蹄，也是第一次卖东西。因围着我们买马蹄的人太多了，有一位村民买了我一大竹篓马蹄后未付钱就溜走了，而我还在继续给下一位村民称马蹄，我堂姐骂我为什么不

收那人的钱，当我反应过来时，冲出人群去找时，那人早已溜得无影无踪了。那天天黑才回到家，堂姐把此事告诉我父亲和家里人，把父亲气得半死，以后再也不让我去卖家里的马蹄了。后来，我考上了油校，离开了家乡，来到茂名读书工作生活，而那次卖马蹄的经历也成了自己人生中唯一一次在集市上摆卖东西的青涩记忆。

如今，电商微商、线上销售、直播带货风行，村民也足不出户便可销售自己种养生产加工的农产品，轻松方便快捷，与40多年前翻山越岭、走乡串墟去摆卖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矣，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真是天翻地覆。